

章太炎与近代经学一瞥

邓秉元

在章太炎这里,尽管表述尚不清晰,但经学其实已经同时得到了四个定位:作为史学与官方意识形态的经学,作为宗教神学的西汉经学,以及作为哲学的义理之学。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定位都是站在经学以外的立场上,从功能角度进行的。重新清理章太炎与近代经学的关系,对于试图从知识体系角度接续传统文化的新的经学形态而言,无疑是学术上的应有之义。

经学是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基石。清代以前,尽管不同学派对经学的理解存在很大分歧,但有一个方面却是共同的,经学作为“常道”被广泛视作真理之源。但是,随着晚清西学东渐的加深,原有知识体系迅速被西方学术体系所取代,经学也被肢解为文史哲等不同学科的对象,对经学的界定则因为视角的不同,呈现出众说纷纭的局面。

经不单指六经六艺,而属于工艺学概念

在《国故论衡·原经》

中,章太炎曾专门探讨经学概念的起源与变化。章氏指出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经并不单指主要被儒家所推崇的六经或六艺,而是本来属于工艺学的概念,即织布时在织机上用来起纵向维系作用的经线。战国以降,不仅儒家把自身经典称作“经”,诸子百家也同样可以把自己认同的经典称作“经”,譬如墨子有《经上》《经下》,《老子》被称作《道德经》,《国语》所谓“挟经秉枹”,把兵书称作“经”,等等。《白虎通》所谓“经者,常也”,尽管诸子百家各有其对常道的理解,但都把自身学派的经

典称作“经”,本身便是承认了常道的意义。换句话说,诸子百家虽然观点不同,但都是在同一个知识体系中相互理解,这个知识体系即是渊源于上古三代的王官学。所谓“礼崩乐坏”,便是指这个以王官学为内核的周代礼乐文明的崩解。假如给这个过程一个抽象的表达,便是《庄子·天下篇》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道术分裂之后产生了不同进路的“方术”,或者说“一曲之术”,其典型形态分别是“邹鲁之士、缙绅先生”的《诗》《书》礼乐之学、“散于天下,之于中国”的百家之学、以方技术数为中心的“旧法世传”

之史学。

《诗》《书》礼乐之学即周代早期的“乐正”四教,这是春秋以前贵族人文教育的共同基础。士人入仕以后,“宦学事师”(《礼记·曲礼》),由此学习各种“师傅曹习之学”,这就是所谓“旧法世传”的史学。这种史学也就是经世致用的外王之学,相当于时下的自然与社会科学,与后世的历史研究不可同日而语。由于周代早期的世官畴人制度,技术之学往往在家族之内传承,因此常常表现出“家学”的面貌。东周以后,王纲失序,各地诸侯趁机独立发展,政教人才流散四方,这是私学兴起

的基本原因,先秦诸子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在这个意义上,先秦诸子共同分有了以周代人文教育(乐师)与技术教育(史官)为内容的同一个知识体系,并予以新的变化,这就是经子之学。其中,以孔子为代表,试图通过“具体而微”的整全方式接续传统学术的便是经学,而“各得其一”的便是子学。经学属于广义上的子学,子学也可以看作广义上的经学。

广义上经学对应着整个华夏文明,作为经典编订者的孔子,则是狭义上的经学创立

(下转 10 版) ➔

◀ (上接 8 版)

漏页,也不放心委托他人去做。为了追踪章太炎的行踪,他会尽可能地把涉及某一次出行的报纸(全国性与地方性)仔细翻阅一遍,时间跨度往往在一年以上,“除了海外影印的一部分,基本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一页一页地翻出来,每次看到目录上没有的新材料,就会特别兴奋。”

不急不躁,四五年过去了,马勇没写别的东西,每天从早到晚,一门心思地阅读和消化与章太炎有关的文献。章氏丛书很难断和读,他就根据上海人民出版社的 8 卷本,试着自己去点校。“读不懂就大声地读出来,这是以前老先生教的办法。”正确与否,马勇坦承心里没底,“可能标的很多地方有相当之错误,毕竟我们的学问不如太炎先生。”

和关注章太炎研究的许多人一样,马勇也曾以为《全集》止于 8 卷本,没有下文了,“当时的感觉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永远不会出新的集子了,结果他们把 40 年前的选题又重新捡了起来。”在清史委员会立项时,他以这些年的阅读为基础,报了《章炳麟全集》的题目,共 20 卷,总字数超过了后来的新版《章太炎全集》。

结项以后,马勇心里很踏实,也不想出版了。这时,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老社长王兴康前来拜访,希望双方合作,共同去完成《章太炎全集》。马勇早期的两本书都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直很有感情,如今又是与章太炎有关的大工程,认同感就更强烈了。“毕竟是几代学人的奋斗和接力,如果在我这里把缺口合拢,我的内心会获得一种满足和释放。”后面的事情进展得很顺利,他

根据出版社的要求,提供整体框架所需的文献资料,出版了《书信集》《译文集》《太炎文录补编》等集子,“我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给了社会,对于章太炎,对于中国现代学术史,做了我应该做的。”

章太炎一生交友广泛,留下了大量的书信和函电。在他的通信名录中,既有黄侃、钱玄同、朱希祖等章门弟子,也有李鸿章、黎元洪、孙中山这样的政治人物,以及学界的胡适、蔡元培、罗振玉等。可以说,《书信集》对于研究章太炎学术思想以及中国近代史来说,是一份极为重要的历史资料。《译文集》收录了《斯宾塞尔文集》《社会学》《拜伦诗选》,其中的《社会学》是章太炎翻译的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理论,这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第一部社会学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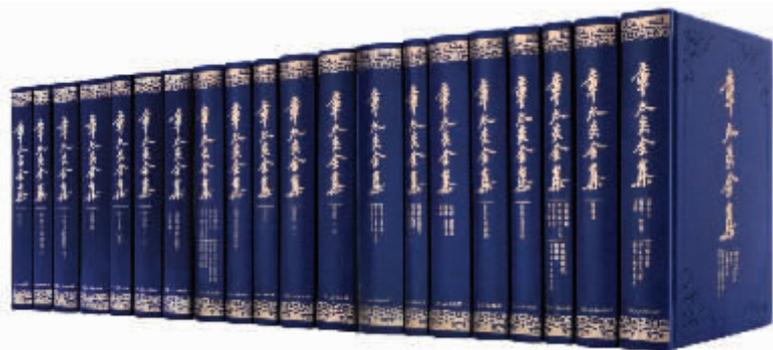
“很多人只能望而却步,更多的人干脆就绕着他走。我们用了 40 年的时间去整理和出版全集,是为了让更多人去翻越大山”

漫长而艰辛的“接力马拉松”抵达终点——收录最全、整理最精的《章太炎全集》(17 种、20 册)已经与读者见面。“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伟大工程,意义相当于孔子整理六经、东汉的郑玄和马融整理先秦以来的典籍,以及乾嘉汉学整理到清代中期的古代典籍,通过出版章太炎的全集,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学术的一次最系统的整理。”马勇认为,将来的出版若能进一步扩充,应当配合做一些章太炎学派的研究,而不是仅仅是章黄学派。

彼时年轻,而今古稀,全程参与并见证历史的章念驰百感交集:“先祖在研究中国近代史和学术史上是绕不开的关键人物,但由于他的著作没有系统的整理和出版,让很多人只能望而却步,更多的人干脆就绕着他走,只有少数人敢于从他的身上翻越,从而取得一览众山小的境界与成就。”

章太炎这座大山究竟有多难爬?“先祖的政治经历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乃至二次革命、护法运动、抗日战争,要正确地把握这段历史绝非易事。这代人的革命又往往通过学术来表达。作为国学大师,他的学术涵盖小学、经学、子学、佛学、哲学、文学、史学、医学,十分宏富和深奥,并且在这些领域里取得了开创性成果,构建了中国学术文化体系与话语。”章念驰说,先祖的文字古奥,即便是政论性的文章,也有新名词、旧典籍,加上各种外来语言的翻译标准不一,以及人名、别名、号名、字名、书名、篇名,今人看来如阅天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王兴康先生曾将我先祖父的经历与学问比作一座大山,我们用了 40 年的时间去整理和出版全集,是为了让更多人去翻越大山。”

许嘉璐为《章太炎全集》作序时写道:“先生舍身求义于民族危亡、国粹陵替之际,后学拜诵校理则值民族复兴、文化蓬勃之春,先生以文史传民族命脉,国运必复之论,今也益见其先知矣。”在他看来,《全集》的出版解决了历史与学术资料传承的缺失问题,也填补了出版事业的空白。“现在的编辑出版水平已经超越了上世纪 80 年代的 8 卷本,这意味着我们不是一味重复前人的工作,而是应了日日新、苟日新的老话,创新正是太炎精神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章太炎全集》共 17 种、20 册,自重启整理工作至今,已全部与读者见面。

均资料照片